

■ 刘德军 主编

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组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述评

4 文化卷

仲崇建 乔丽荣 / 著



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LONGHUAREN MINGONGCHU GUOSHI
HUPIN WENHUA JI LUAN

济南出版社

刘德军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述评

4

文化卷

仲崇建 乔丽荣 /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述评. 4, 文化卷/刘德军主编; 仲崇建, 乔丽荣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488 - 0138 - 2

I. ①中… II. ①刘… ②仲… ③乔… III. ①中国—现代史—研究—1949~2009 ②文化史—研究—中国—1949~2009 IV. ①K270.7 ②K2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659 号

责任编辑 张慧泉

封面设计 李兆虬 焦萍萍

书 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述评·4 文化卷

作 者 仲崇建 乔丽荣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发行热线 0531 - 86131731 86131730 86116641

编辑热线 0531 - 86131719 86131720

印 刷 山东省恒兴实业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5 × 23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0 千字

总 定 价 196.00 元(共 7 卷)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电话: 0531 - 86131736

总 序

岁月铭刻着奋斗的艰辛,历程映射着道路的探求。新中国成立以来风雨历程,尽管道路曲折,奋斗艰辛,但成就辉煌,经验宝贵,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坐标上,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灾难深重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两件大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② 这是必须弄清楚的共和国历史的主流和主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举

^① 刘云山:《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建》2009年第4期。

^②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272页。

世瞩目的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一是从争取经济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是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是从打破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五是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① 这是要充分肯定的历史性巨变与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断探索适合新中国国情和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得到弘扬，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应必须清醒认识的共和国历史的本质性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辉煌历程，彰显着共和国造福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魂与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魂。

历史事实深刻地昭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其中，社会主义道路规定了我们立国的政治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立国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立国的指导思想。

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六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即：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①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184-185页。

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所有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历史进一步明确地告诉世人:“三个动力”是发展中国的重要法宝。一是制度与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开创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二是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上述所有这些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是共和国历史所蕴含的厚重真谛,也是从规律层面上所凸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尤须认真总结、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

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人们也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述评》一书的根本主旨就是:通过评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轨迹、伟大成就和基本历史经验,阐明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开辟新纪元、走上新道路、开辟新局面的历史;也是一部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积极进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探索为人民服务规律、更新为人民方法的历史。让历史告诉人们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从而唱响时代主旋律,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同心同德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下:

一是框架结构。全书设政治、理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卷。每卷

均以历史发展轨迹为纵线,重点评述重要方针政策、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深远影响等,通过每个侧面反映共和国历史的全过程,同时点评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规律问题,使人们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二是研究视角。全书紧紧抓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中心,全方位、多视角地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研究,既纵述历史发展轨迹,凸现基本经验与规律性问题,又从政治、理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方面专题评述,以拓展共和国历史研究的视野。

三是研究方法。全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客观、公正与写实的原则,运用纵述与横评相结合、历史逻辑与思维逻辑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等方法,阐明历史背景与基本内容,点评历史影响与问题走向,从而达到问题研究的整体性与深刻性。

本书是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也是刘德军教授主持的山东省高等学校基础学科专项基金项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题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书稿完成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外交部等部门组织专家进行了审读,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在本书编写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述评》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撰著者又均是在教学之余伏案撰文,加上水平所限与时间较紧,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地期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刘德军

2010年7月27日

于济南西部大学城轻院宿舍宅内

目 录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	(1)
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1)
二、新中国文化政策的初步确立	(3)
三、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初步构建	(6)
四、新中国初期的教育建设	(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引领的文化建设	(12)
一、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12)
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15)
三、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体系	(16)
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交融的结晶	(18)
第三章 批判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26)
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6)
二、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	(29)
三、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33)
四、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35)
第四章 新社会风尚的树立	(40)
一、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	(40)
二、移风易俗树立社会新风尚	(49)
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成就	(54)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及挫折	(61)

一、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61)
二、向科学文化进军和“双百”方针	(63)
三、文化界的反右派斗争	(65)
四、“大跃进”中的文化“跃进”	(68)
第六章 文化与“文化大革命”	(75)
一、文化建设的调整	(75)
二、“左”倾错误的抬头	(79)
三、“左”倾错误的扩大	(82)
四、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	(85)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纠“左”	(90)
第七章 文化复苏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97)
一、否定“黑线专政”论,实行新的文化政策	(97)
二、平反冤假错案和文化复兴	(103)
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07)
第八章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	(111)
一、“文化热”的出现及其表现	(111)
二、“文化热”的原因和背景	(115)
三、“文化热”中的主要议题	(116)
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	(132)
五、对 80 年代“文化热”的评价	(137)
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140)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出及重要特征	(14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和成就	(145)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存在的问题	(157)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	(160)
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的提出	(160)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164)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和启示	(171)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阶段	(177)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问题和新决策	(177)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188)
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97)
第十二章 共和国文化建设历程回眸	(20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20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走向繁荣	(206)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不断壮大	(220)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	(225)
主要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5)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

“民族之斗争,要依着文化的斗争而并轨同驰,有了民族的斗争,而没有文化的斗争,则民族的斗争失去了助力。有了文化的斗争,而没有民族的斗争,则文化的斗争失去了方向。”^①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妥善地解决了文化问题才取得了建立新国家新社会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同样重视文化建设。但是,文化建设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由革命性文化转变为建设性文化。文化建设不再是围绕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进行,而是围绕新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迥然于旧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展开的,它的任务就是凝聚社会各种力量,把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烂摊子,改造成一个新的社会,可谓任重道远。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以文化政策为核心的相关内容。

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就涌向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平。他们要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总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成就,明确未来文化建设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同时筹备全国性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党中央对于这次文化会议颇为重视,从会前发出的贺电可以看出,刚刚执政

^① 陈安仁:《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1页。

的中国共产党是把这次会议纳入了国家建设的范畴来思考的。电文大意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希望全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① 当时，国内外文化界的人士就是通过这次会议来解读将来共和国文化政策的走向。因此，这次文化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次政策吹风会。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胜利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824人，实到650人。郭沫若为代表大会的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7月2日，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词。在谈到文化建设面临的使命时，朱德强调：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胜利后，将要把主要力量用在建设方面。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7月3日，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自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艺。全体文艺工作者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团结之外，还要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努力用文学艺术的武器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现在，文化建设要转变到深入现实，为新国家服务的重点上，努力创造有思想内容和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充分吸收苏联的经验。7月4日和5日，茅盾和周扬先后都作了报告。他们分别从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化革命和建设的两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还必须同人民大众结合，贯

^①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55页。

彻执行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无愧于中国人民和时代的作品来。7月6日,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走近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兵。否则,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他为大会提出了文化建设面临6个问题: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改造旧文艺问题、全局观念问题和组织问题。这6个方面的问题是新国家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引导了与会代表们的讨论。最后,大会以《宣言》的形式作出了总结。随即,大会下属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工作协会相继宣告成立。

这次文化界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多层的象征意义:一是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由革命走向建设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大会,堪称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的战略大转移;二是标志着文化界的胜利会师,长期以来奋战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化大军为了国家的出路和民族的复兴终于走到一起,并为新生的国家筹划未来;三是肯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明确了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崭新的一页。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了贯彻大会既定的文化方针,周扬主编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该丛书以出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为主要内容,到1949年底,共出版作品53种,涉及小说、戏剧、曲艺、诗歌、报告文学等。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也成立了由丁玲、老舍、艾青、赵树理、李伯钊、田间等组成的“文艺建设丛书编辑委员会”,主要出版反映工农兵内容的作品。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等小说;还有丁玲的《跨到新的时代来》、企霞的《光荣的任务》等论文集以及柯仲平的诗集《从延安到北京》等。许多反映新国家建设的文化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展现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良好开局。

二、新中国文化政策的初步确立

新中国的治国方案基本上是按照《共同纲领》展开的,文化的建设也是

如此,尤其是3年恢复时期。这基本从3个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其一,巩固和发展老解放区文化;其二,接受、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机构,批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其三,推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3个层面同时也体现了新中国文化政策的基本内涵,并据此构建了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

(一)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建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精神动力。而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从而形成凝聚力。因此,文化建设也就成为事关立国之本、治国之道和兴国之路的大事。列宁也曾告诫无产阶级政党:“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半的政治教育或专门的艺术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①从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文化的态度和对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的重视,就足见党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然而,基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状,再加上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具有极大的历史继承性,这就使新中国文化建设凸现出极大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急迫性。社会上还存在黄赌毒问题、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和新文化的宣传问题等等;文化机构的改革问题亟待解决;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代之而起的是有利于新生政权巩固的革命的文化教育。人们常说窥一斑而知全豹,上述提到的每一个不利于文化建设的因素,都预示着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帝国主义对新生政权的封锁和包围以及刚刚执政的共产党正处于选择国家建设道路和模式之中,这一切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来说,又具有历史的急迫性,文化建设要承担起保护和巩固新生政权的历史使命。鉴于以上原因,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包括文化在内的施政纲领,并得到与会各界的普遍认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1页。

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二）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政策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中专章论述了文化政策，规定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施政纲领。其历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规定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当时文化建设的具体政策以及为实施这些政策所建立的文化机构。

首先，明确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其次，规范了在文化领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体现在社会风尚上，“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体现在科学方面，“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奖励发现、发明和优秀科学著作，普及科学知识；体现在文艺方面，提倡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艺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体现在教育方面，实行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育方法，尤其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体现在体育卫生方面，“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体现在新闻出版方面，“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发展人民广播、出版事业。

再次，建立新中国的文化领导机关和行政机构。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把它作为文教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任命文化名人郭沫若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马叙伦、陈

伯达、陆定一、沈雁冰为副主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职责为：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对其所指导的机关和下级机关，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执行情况。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任命沈雁冰为文化部部长，马叙伦为教育部部长，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

上述3个方面的政策是《共同纲领》的3个层面即巩固和发展老解放区文化；接受、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机构，批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推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实践中的展开。它在指导建国初期旧文化的改革和新文化的建立上，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无疑，它又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这是与新民主主义国情相适应的客观体现，更为直接地是为了满足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建设随着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践必然会发展变化。

三、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初步构建

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文化体制很不健全，很难依靠它实现文化建设的目标，必须建立新的文化体制领导和整合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引起党和人民政府对科研工作的重视，而当时的科研机构却难以让科学家发挥其才智。中央考虑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并由郭沫若负责。中国科学院的筹建标志着新中国文化机构的建设的开始。

1949年6月中旬，中央决定由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备建立科学院，恽子强（时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和丁瓚（中共南方局系统党员，在知识界从事革命活动，曾任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主任）协助陆定一工作。钱三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和黄宗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与其事。7月13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上讲话时宣布：不久的将来必须成立为人民所有的科学院。他号召科学工作者参加筹划工作。科

学院筹建期间,许多在国外颇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回国,如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葛庭隧、曹日昌、钱学森等。他们抛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设备条件,冲破一切阻挠,毅然回归祖国,为新中国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据此在政务院之下设“科学院”,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它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和出版总署等政府部门同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导。科学院又有别于政府其他各部,它直接领导若干研究所,而不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置相应的地方分支管理机构。当时由于尚未成立社会科学院,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由其领导。首任院长为郭沫若,副院长为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陈伯达等。科学院下设计划局、编译局、联络局等单位。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始办公,后来即以此日为中国科学院成立日。院址最初临时借用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11月23日迁入王府大街9号;1950年6月23日迁至文津街3号静生生物调查所原址;1966年迁往西郊友谊宾馆北馆;1970年7月,迁往三里河路52号原国家科委旧址迄今。

科学院成立后,便对旧社会的一些科学机构进行接管,如在北京,科学院于1949年11月5日,从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接收了原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及所属的原子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史学等6个研究所,以及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的图书史料整理处;12月16日,接收静生生物调查所,随后成立了以吴征镒为负责人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12月21日,接收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上海,1950年3月21日接收了中央研究院的化学、植物、动物和工学4个研究所以及医学和药学两个研究所筹备处,北平研究院在上海的生理学、药物两个研究所和物理学研究所的结晶学研究室。在南京,4月6日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和社会、物理、气象、天文、地质5个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至此,原中研和北研的直属研究所接收完毕。科学院以这些机构为基础,加以调整,组建了第一批新的研究所或其分支机构。科学院还提出了科学研究的方针,为了改变旧中国科学工作脱离实际的作风,真正发挥科学的功能,党和政府组